

◎文学聚焦

幼儿文学发展经验值得重视

王泉根



母亲育儿的摇篮曲，外婆教唱的童谣儿歌，幼儿园阿姨诵读的童话故事，舞台上演出的儿童戏剧，还有五颜六色引人入胜的图画书……这就是幼儿文学。幼儿文学是文学女神在未经开发的幼者心田，撒下的第一片爱之花种，洒下的第一瓢美之甘露，投射的第一束善之阳光。20世纪以来，中国幼儿文学走过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五代作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品佳作，陪伴了数代孩子的童年岁月，哺育了亿万童真的精神成长。

如果要问今日中国最长寿的杂志是哪一种？你恐怕不会想到是幼儿文学期刊《小朋友》。这本由中华书局于1922年4月创办的杂志，现在仍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刊，今年已经96岁“高龄”了。

童心无疆，幼者为本。中国幼儿文学不但是中国文学/儿童文学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板块，也是世界儿童文学/幼儿文学中的重要艺术组成部分。

早在上个世纪初叶，我国幼儿教育就开始了以幼儿文学为具体教学载体的艺术实践与探索，同时开启了现代中国幼儿文学百年历程的发展道路。

回顾中国幼儿文学发展的百年历程，结合今天的现状与继续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以下“经验”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是坚守“幼者为本”的儿童观与行动哲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中国儿童观的转变，即由从前的“父为子纲”“成人中心”努力转换为“幼者为本”“儿童中心”。鲁迅先生1919年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是中国人儿童观转变的宣言书。鲁迅力倡“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社会对于儿童“应该健全的产

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这些先进观念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幼儿教育/幼儿文学努力为之的方向与行动哲学，“幼者为本”是当时出版的一大批幼儿教育论著的重要教育思想，有着中国早期幼教事业自身的实践探索与本土经验。

其次是突出做人的观念，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和正面价值观。

幼儿教育是育人、树人、立人的关键性开端，是为一生做人打基础的时期。因而引导孩子如何做人处事为学，如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成为了幼儿教育/幼儿文学的核心价值追求与文化责任，而这也正是家长、幼儿园、社会大众寄予幼儿文学的殷切期待。

在今天，特别需要强调儿童文学的价值目标，诚如曹文轩所提出的“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即通过艺术的形象化的审美愉悦来陶冶和优化儿童的精神生命世界，形成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基础、最根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生态观，夯实人性的基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

第三，千方百计使幼儿文学界与幼儿教育界高度融合。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包括幼儿文学之所以能在“五四”以后的短时间内出现跨越式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学校教育高度重视儿童文学，许多教育家都是儿童文学的热烈鼓吹者、实践者、推广者，从而使儿童文学与学校教育一直“不分家”。当时的一流教育家、艺术家、出版家如陶行知、陈鹤琴、沈百英等，怀着为民族下一代谋福祉的愿景，大专家乐于做“小儿科”，而且是专心致志地高品位、高质量地做“小儿科”的

事业，包括幼稚园读本、幼稚园教法用书以及幼儿文学各种文体的编写和小朋友最喜欢的图画书的制作，都努力地做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甚至是与欧美发达国家接轨的国际水平。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发扬这一传统，力倡幼儿文学界与幼儿教育界两界高度融合，作家进校园，教师懂文学。实际上，具有丰富小教、幼教经验的教师，最容易成为幼儿文学作家，如叶圣陶、陈伯吹、孙敬修、方轶群、张秋生、蒲清华、郑春华、杨红樱、苏梅等，都曾当过小学或幼儿园老师。

第四，幼儿文学的各类文体与艺术门类应全面发展，用以适应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的需要。

幼儿文学是包含了多种文体门类的文学。21世纪的幼儿文学实际上包含了儿歌童谣、幼儿诗歌、童话、故事、幼儿散文、图画书、幼儿戏剧、电影等多种文学艺术门类。在幼儿文学的创作、出版、阅读推广等方面，应注意各类文体和艺术门类的良性布局与全面发展，而不能以偏概全，乃至“一花独放”。现在有一种需要关注的倾向，幼儿园老师和家长只给孩子讲图画书，忽视了儿歌童谣谜语等在养成幼儿语言能力、智力训练方面的作用，也忽视了童话、故事、幼儿戏剧等对幼儿的审美教育、情感教育与综合素质培养的作用，这是应予警惕的。

回首过去，历史已为中国幼儿文学的百年历程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展望未来，未来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与革新，为民族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为共和国的文学史书写新的篇章。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那匹草原深处的蒙古马

——《流水似的走马》编辑手记

苏日娜

每当翻开鲍尔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马》，走进它的字里行间，我相信这本书里住着一个从远古、草原深处走来的蒙古马的灵魂。它带着“岩石的顽强，河水的纯净”，带着作者对草原、民族的深情以及因此潸然而下的泪水驰骋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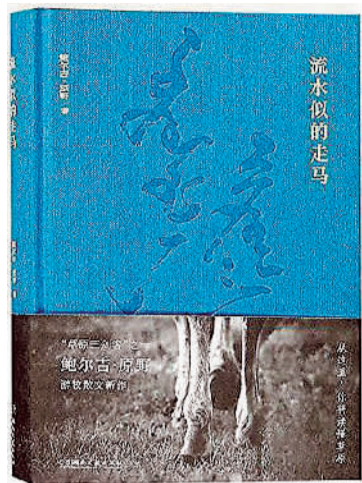
鲍尔吉·原野是我从小就十分喜爱的作家。经过了解，我才知道他竟是和自己同民族的蒙古族作家。鲍尔吉是蒙古族部落中黄金家族的名号，原野则是他的名。文如其名！我为自己民族有这样的作家而骄傲。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我部门正筹划推出“大风名家散文系列”。2014年，我联系到了原野老师，原野老师决定把自己按题材分集的散文集《像神一样生活》放到“大风散文”这个系列。这本书上市之后，收获了不少好评。

散文家陆春祥直言道：“这本书根本就不能算代表原野最高水平的作品，代表他最高水平的作品在内蒙古草原的深处还有待发掘。”原野老师反问：“苏日娜，你觉得呢？”我回答：“我赞同陆老师的意见，作为一位懂母语的优秀蒙古族作家，您可以了解到草原上的牧民的真正生活是什么样的，能告诉今天的我们他们的所做所想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在这样的交流中，《流水似的走马》这本书有了策划构想雏形。原野老师说：“大家的意见让我有了一种使命感，一种传承民族文明的使命感。”

从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到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我很清楚原野老师的采访工作有多么辛苦，有些偏僻的牧业区不通汽车，如果能搭个牧民的顺风车就是再幸运不过的了，这个“车”可能是三轮车也有可能是牛车；没有住宿的地方在牧民家里凑合也是常有的事。然而每次讲到这些的时候，原野老师却不以为意，兴奋地说：“我现在处于创作的亢奋中，我见到了许多有爱的人，有猎人、驯马师、牧羊人、银匠、接生婆……记录下他们的故事让我欢喜不已。”

《索布日嘎之夜：我听到了谁的歌声？》《火的弟弟》《蒙古高原礼赞》《流水似的走马》《我认识的猎人日薄西山》……我收到一篇就迫不及待看一篇，我只觉得那里有个鲜活的草原灵魂，它在



在奔驰，在召唤，在沉吟，在低诉……某一时刻突然与你的灵魂紧紧依偎，怀着温暖的爱与你相拥，这时候你就忍不住热泪盈眶。这些与我从前看的他的作品不大一样了。之前的是玲珑精致，现在是雄浑苍凉，有对生命、大地、过往和现在耐人寻味的思考，他复活了草原的灵魂。

在读过《蒙古民歌八首》之后，我又把这些熟悉的旋律听了数遍，原野老师的文字与旋律融为一体，我不争气的眼泪再一次涌出来：折折叠叠的河流、如幻似影的晨雾、飘向远方的云朵、于苍茫中伫立的黄马、长睫毛下注视着你的白马的眼睛……一幅幅画面从天际闪进脑海，那一刻我顿悟了，明白了故土、思念这些词对一个人的意义，它们铭刻在骨头上，流淌在血液中，闸门一旦打开，便大海般在情感的世界里奔涌，生生不息……

原野老师也会给我讲一些作品外的故事，比如在写完《索布日嘎之夜：我听到了谁的歌声？》之后，他讲了吉布吐村和索布日嘎的牧民为他专门举行篝火晚会和赛马比赛的事，让他深受感动和震撼，后来也写进了他的领奖词。站在自己近三十年的创作坐标中，原野老师小心翼翼地描摹着生命使命和心灵归属……2018年8月11日，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流水似的走马》榜上有名。我对原野老师说：“作为蒙古族第一位获得这个国家最高文学奖项的作家，您创造了历史，我由衷地为您感到高兴和自豪。”

感伤、超拔、在场

——读华清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

王士强

张清华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而知名，作为诗人的张清华不太受人关注，而实际上，是先有了诗人华清，才有学者张清华。

201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形式主义的花园》是华清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此时距他开始诗歌写作已过去30余年。在他阳刚、豪放的外表下住着另一个温柔、细腻的自己。感伤是其个性特征中不易察觉但却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底色，是探窥其精神世界的重要密码。它既是一种心理状态，更是一种生命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标示出人生的厚度、深度与智慧、悲悯等等。华清的诗具有较为明显的抒情性特征，他的诗有“我”，有血有肉，而同时往往对抒情对象进行整体性观照和综合化处理，将时间空间化，将空间时间化，情感的表达更具弹性和复杂性，异质混成，有现代性。

而同时，如其一首诗的题目《从诸神的方向看》所示，华清的内心又是超拔、高迈的，他有着显明的对于精神性、理想性的热爱和追求。本质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对自己有着高的要求，对世界有着高的期待，他的诗有着较高的精神纯度，有着宏阔的精神追求。他不是世俗层面循规矩步的行走者，而更像是一只飞行在高空的鹰，对于“彼岸”的关怀与想象，有对于形而上事物的热忱与冥想。

华清精神世界是丰富、高迈、超越性的。从诗集作品的目录可以见出，华清精神对话与交流的对象包括了肖邦、贝多芬、曼德拉、达利、梵高、屈原、帕瓦罗蒂等，其中既有对艺术之美的钦慕，也有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对命运的思考等等，其中体现着华清理想中的人生形态。他的诗歌有着形式主义的、修辞的、形而上的追求，的确构成了“形式主义的花园”。当然，这一“花园”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而是有着明显的精神性、思想性价值追求，这里的“形式主义”与



“理想主义”一定意义上也是同义的。“形式主义的花园”指向一个更为切近诗性核心、想象性、精神性的世界。

但另一方面，华清的诗又是在场的，有时代感和现实性，而不是一味的凌空蹈虚。这里的“在场”首先是“人”的在场、个体的在场、情感的在场，是能见出个体的性情以及真实性、复杂性、丰富性的，更重要的则是在生活的现场、在时代的现场，能够从文字中见出时代和社会的样貌、纹理及嬗变。作为感伤、超拔之外的一种结构性存在，诗歌中的在场甚至是一种矫正的力量，它阻止了感伤向自怜、自恋的滑落，也阻止了超拔向虚无、冷寂的嬗变，增强了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和及物性。华清所经历的时代，激烈变革、震撼人心，此种时代性变化也在呼唤着诗人做出表达。华清的诗有不错的比例在书写乡愁，《给旧友》《童年》《露天电影》《致1976》等等，但他所写的乡愁不是静止的、乌托邦式的乡愁，而是将其置于时代、社会、人生的流变之中，对之进行反思、追忆、缅怀，有着复杂的意味。他敏感于时代的变化，从侧面之做出表达，比如《麦地的三月》中对海子墓前跳广场舞大妈的书写，极富张力。

感伤、超拔、在场，三者既互相齟齬而又相辅相成，组结一体、螺旋上升，构成了华清独特的诗歌世界。

◎作家谈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浅谈地域文化对我创作的影响

刘一达

首先要承认一个事实，凡是有自己写作风格的作家，是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地域文化的。其次，才能说到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创作的影响。

40多年前，中国文坛出现过许多文学流派，比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鸳鸯蝴蝶派”“京派”“海派”等等。这些流派的作家都各有自己的写作特点，而他们的写作风格特点跟他们所生活的地域有直接联系。不可否认，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地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

我被人称为京味儿作家，京味儿也可以称为“京派”。京味儿作家的提法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又不断有作家涌现，风格特点逐渐成熟。

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亲身经历了胡同的改造和变迁，对北京文化的情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胡同文化已经渗透到我的骨髓里，所以当从事创作时，我所使用的叙事方法和语言，自然而然地会带有京味儿特点。

京味儿文学创作到现在已经有四代人了，第一代以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第二代以老舍、张恨水、梁实秋等为代表；第三代以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刘绍棠等为代表；我属于京味儿文学的第四代。2017年，我作为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人，申遗成功。现在京味儿小说语言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回顾地域文化对我创作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文学前辈创作风格对我的潜移默化。我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和老舍先生的作品，还上小学时，就读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二马》《骆驼祥子》等小说，还看了他

写的话剧《茶馆》等，他的京味儿写作风格深深影响了我。

我记得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就用的是京味儿语言。当时还是自然投稿，编辑看了我的文章，以为我是一位老北京人呢！其实，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编辑见了，感到很诧异，问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北京土话呀？我告诉他，正在搜集北京土话，他才释然。

二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由于我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丰富多彩的北京人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生活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这些对我的京味儿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16岁便初中毕业，被学校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我的师傅都是老北京人，那会儿，每天在班上跟这些师傅们在一起摸爬滚打，他们聊天讲故事，耳濡目染，受到的都是京味儿文化的熏陶。积累了许多文学创作的素材。

我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的一线记者，主办过《京味报道》《收藏》《广角》等专版。也正是从那时，我开始从一般性的即时采访报道，进入到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北京文化。

当时北京城进入了历史上少见的城市大改造，大批胡同被拆，大批住胡同的老北京人搬到了郊区，加上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北京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忧患，我深深感到抢救北京文化的历史责任。

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和胡同采访，寻找搜集第一手材料，被北京人称为“胡同记者”。这一时期，我创作了大量的纪实文学作品，出版了二十多本反映改革开放后京城发生



巨变的纪实文学，使我的京味儿语言创作特点更加鲜明。

前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专著《北京话》，这本书当年被评为季度中国好书，2018年12月，又被书香中国举办的读书盛典评为好书，现在已经再版，此书的大量北京土话就是我在工厂当工人时搜集的，可以说这本书我写了40年。由此可见，地域文化滋养了我，我的创作丰富了地域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地道的北京人，这些年，不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纪实文学，不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和话剧，我创作的选题和关注的视角，始终都集中在北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给了我创作的土壤，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天地。是这座八百多年的帝都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是生活在这座都市里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人，给了我创作的源泉，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动力。